

张占斌 / 著

中国式崛起

渐进改革与 政府公共政策选择

理论创新

与中国与时俱进的突破

改革发展

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

国际竞争

与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

公司治理

与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

公益事业

与中国彩票政策的选择

人文精神

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反思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式崛起

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

张占斌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张占斌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

ISBN 7-5073-1685-8

I. 中… II. 张… III. ①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②公共政策—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9860 号

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

作 者/张占斌

责任编辑/李庆田

封面设计/李 栋

版式设计/程建华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照排中心

印 刷/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1000×1400mm 16 开 26.25 印张 434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3-1685-8/C·234

定价:4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张占斌，曾用名张湛彬，男，1962年11月生，吉林省白城市人。历史学硕士（吉林大学中国经济制度史专业，导师乌廷玉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导师王瑞璞教授），经济学博士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理论经济学专业，导师林毅夫教授）。1986年后曾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政治

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从事研究、教学、咨询和管理的工作。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现系中共中央组织部博士服务团成员，在重庆市某地任职。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新中国企业领导制度》（春秋出版社，1988），《博彩业与政府选择》（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股票期权与国有企业激励制度》（辽海出版社，2002），《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比较优势：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模式、战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等。政治学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政治发展与当代中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在《中国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经济研究参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战略与中国崛起、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城市经济与政府管理。

前 言

根据有关领导、专家和读者的建议,我们在1999年10月和2002年1月两次印制了作者的《求索中国:渐进改革与制度创新》(四册,共160万字)和《中国渐进改革前沿热点问题报告》(上、下两册,计80万字),做为内部资料征求意见。2003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作者的《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国家经济安全体系》(一册,计40万字)。

为加强对“中国式崛起”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作者又编辑了《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一书。该书收录了作者近20年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热点问题的部分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的报刊杂志,有的系在国际国内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或讲座,有的系国家有关部门课题及委托项目研究报告,还有一些是供党政领导及企业高管人员参考的内部政策建议和调研报告等。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北京华教育人图书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有关同志汤应武、句华、张国华、缪晓敏、史义军、程建华等先后参加了本书的相关工作。作者修改并审定了全文。

作者希望围绕“中国式崛起”分专题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并长期坚持下去,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提炼,形成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和研究结论。我们期待领导、专家、读者各方面的指导意见。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研究所

2004年8月·北京

序

于光远

张占斌同志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书稿从理论创新、改革发展、国际竞争、公司治理、公益事业、人文精神等方面，回溯和探讨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及和平式崛起问题，许多问题涉及当代中国的重要决策、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内容和思想都很丰富。

占斌同志书里所写的这些历史和现实，我是熟悉的，而且许多事情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他的书稿也让我回想起当代中国走过的历程。历史是需要人们时刻反思的。我曾经说过：“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苏联的一个话剧里面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剧名大概是叫《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这话《列宁全集》上没有，也许是剧作者编出来的。不管是不是列宁的原话，这句话的意思很好。不过我还是对它做了一个修改。我觉得列宁那句话（姑且假定列宁真的讲了那样的话）两个子句都只说了过去，而没有说到未来。我加进“未来”的字样，为的是讲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会有人去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使本来可以进步得更顺利的未来世界受到损害。

现在人们对历史淡忘得很快。这大概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进步越快，世上人们的接触面越广，对新的事物接触得越多，对历史的淡忘就会越快。由此，我也就觉得应该加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因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创造的财富，有的甚至是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取得的宝贵财富，把重复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淡忘了，是很大的损失。

说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反思和应该反思的东西太多了，占斌同志的书里探讨了许多问题，比较深入地总结了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也想谈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这就是关于我国制定和修改宪法的问题。

去年我们国家开始准备修改宪法，修宪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我国立

宪行宪的研究和讨论,极不充分。形成这样的局面有历史上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能发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凭藉个人崇拜,迫害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致其于死地这样的事情。践踏宪法到了这样的程度,而且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对那时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可见,对我国立宪行宪的研究和讨论极不充分的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

当然,前几年已经正式提出“依法治国”。从“和尚打伞”到“依法治国”、“以法治国”,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实行“真正的法治”,就有必要制定宪法。宪法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法。讲求“真正的法治”,需要非常认真地去研究掌握科学的“法理”。现在人们在法理上糊涂观念很多。比方说国家机关发出的红头文件,有没有法律效力,恐怕许多人未必能够正确地回答。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研究,缺乏基础,而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就有必要对我国立宪行宪的历史彻底反思,大彻大悟、下大决心、出大力量、花大功夫,抓紧进行。同时要明白这件事决非一二次会议所能做到的,要给予必要的时间。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当然会有自己的特殊的东西。同时也一定会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相同的东西。我认为应该对我国宪法中是否有违背宪法之成为宪法的东西,进行反思。不作这样的反思,就自以为是地、随随便便地去谈论修宪,就不是认真科学的态度,这是不可取的。

说了这么几句话,无非是借着给占斌同志的书稿作序,讲一点我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反思。我想,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会给人启迪。这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占斌同志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2004年3月于北京寓所

序

乌廷玉

张占斌的论文集《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春节之前他派人来长春送来书稿清样，让我为之作序。看到论文集的内容，牵动了我的思绪，让我更多的回想起了20年前他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的许多往事，以及20多年来与他交往的难忘岁月。我愿意为张占斌的这本论文集作序。首先，他是我的弟子，也是跟随我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他对我非常尊重，但也是第一个敢于公开发表书评对我的著作提出完善建议的学生；其次，他是我培养的几十位研究生中与我联系比较多的一位，他有工作变动都会告诉我，让我放心，我能感受到他的人生求索精神和奋斗情结；再次，我的老伴生前很喜欢占斌，占斌到我家来时，我老伴因患有多年的白内障失明，虽看不到他，但用手慢慢地摸他的头和脸，说占斌胖了或瘦了。这些细节，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忘。借此写序，也是表达对老伴的怀念之情。

在读硕士生时期，占斌年龄最小，21岁大学毕业就读研，24岁硕士生毕业。当时他学习很刻苦，在吉林大学亚细亚文库和中国历史档案馆、东三省的档案馆查找了许多日文资料和原始的第一手资料。那时经费紧张，无法复印，只靠手抄，不少档案已拍成了胶片，只能在投影机上，看，在长达数月的资料抄写时，眼睛都累近视了。他在硕士生期间很注意科研，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有的文章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上，我们还合作出版了《东北土地关系史》等书，显示了很好的学术潜力。后来他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研究方向有了转移。他向我解释过，以求得导师的理解。后来知道他到海南海，又回北京创业，又到中央党校读博士、到北大做博士后，再到国家行政学院等等，经常收到他寄来的著述，看得出，他对学术情有独钟，我感到很欣慰。

我从西北联大毕业后，几十年一直在吉林大学历史系从事隋唐史、土地

制度、租佃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想了想,人生最高兴的莫过于自己弟子的成长和进步,占斌虽然现在不专门做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了,但我认为,硕士生时期的基础对他从事其它领域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许多文章和著述,历史感很强,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任何学术问题,还是需要历史眼光的。

《中国式崛起:渐进改革与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一书即将出版,这是个大题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如果有潜力,要认真做下去,做出大成绩。

2004年3月于吉林大学

目 录

前言	(1)
序	于光远
序	乌廷玉

第一编 理论创新与中国与时俱进的突破

□ 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1)
□ 中国式市场经济“路线图”与制度突破	(13)
□ 聚焦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	(23)
□ “一国两制”与香港、澳门、台湾问题	(29)
□ 改革攻坚阶段的前沿热点问题论纲	(39)
□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实现形式	(44)
□ 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本论与共同富裕论	(48)

第二编 改革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路径

□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转折	(55)
□ 万里“变法”与农村改革的制度突破	(65)
□ 打开国门的决策与中国跻身世界的求索	(77)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91)
□ 从制度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99)
□ 中国式崛起的基本方式和战略目标	(104)
□ 中国和平式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09)
□ 梳理历史: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阐释	(119)

第三编 国际竞争与中国汽车产业的政策

□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源流的梳理及评析	(130)
□ 全球化与国际汽车产业经济特征及竞争趋向	(147)
□ 全球化与中国汽车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152)
□ 技术选择、技术创新与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政策	(157)
□ 资本短缺、融资渠道与中国汽车产业资本政策	(163)
□ 国际汽车产业模式比较与中国发展路径选择	(169)
□ 比较优势与汽车、家电产业政策绩效比较	(179)
□ 政府治理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公共政策	(189)

第四编 公司治理与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

□ 股票期权与中国企业经营者长期激励制度	(194)
□ 西方大企业的融资史及案例分析	(212)
□ 关于青岛双星鞋业股权改革的调研报告	(215)
□ 关于吉林敖东药业的调研报告	(220)
□ 关于内蒙伊利奶业的调研报告	(227)
□ 关于华泰财险业五年发展规划	(230)
□ 关于联想股权改革的思考	(240)
□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的思考	(245)

第五编 公益事业与中国彩票政策的选择

□ 中国福利彩票事业的发生与发展	(250)
□ 中国彩票业的制度安排与政府调控	(263)
□ 彩票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营销制度安排	(275)
□ 彩票基金管理规制、绩效和重新定位研究	(285)
□ 博彩行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政府选择偏好	(297)
□ 博彩品种的适度供给与市场、政府约束	(306)
□ 博彩的特殊需求与政府公益事业筹资选择	(319)
□ 中国博彩业公共政策的初步分析	(327)
□ 关于彩票问题答《公益时报》记者	(341)

第六编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反思

□ 倾囊救国的晋绥红色士绅牛友兰	(344)
□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的心路历程探析	(354)
□ 读《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及其它	(370)
□ 孙平化与中日民间外交	(375)
□ 人才能力培养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383)
□ 市场经济与中国青年知识阶层的报国道路	(392)
□ 寻找职场:走向体制外的官员们	(401)
□ 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	(405)

后记	(409)
----------	-------

第一编 理论创新与中国与时俱进的突破

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

在国内,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和讨论热潮正在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逐步形成:社会主义还不完善,还处在探索和实践。在国外,许许多多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国家,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一理论将为中国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

为什么“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如此引人注目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经历过曲折,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着许多经验和教训,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则标志着党在历经坎坷之后对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合乎中国实际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

一、党对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和初步认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出了中国必定要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科学结论。毛泽东指出,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又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无产阶级的强大,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而必须是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的前途是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

* 写于1987年10月,有关内容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0期和新华社主办的《瞭望》1987年11月第47期。后修改扩充单独一章,收入吴国光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纲》,该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194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是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全国胜利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只能用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因此,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全会对国情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是党在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于现代工业经济只占10%左右,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90%左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基础落后,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需要努力。全会指出,新中国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社会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对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全会初步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力量,发挥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将个体经济逐步引向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将上述并存的五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平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全会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如果我们不能在生产方面做出成绩,并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要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起初是想再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大体是这个阶段要有三五年准备,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建设。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建国后最初三年的工作纲领和战略方针。会上,毛泽东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但后来,毛泽东的认识发生转变,比较早的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开始讲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1953年6月,他在一份报告批语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同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以及在审批中央文件时所作的修改,使基本路线的提法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形成了对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

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

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曾在一份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时对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作了估计,认为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时期,党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

1956年前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宣告,“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并且还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清除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的。在同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建立起现代化工农业的基础,生产力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做了区别,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因此,“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

泽东的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八大的光辉思想,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制度将会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路程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关键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从而使非常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还缺乏认识,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前后这一时期的许多很好的正确思想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这一失误,使我们耽误了约 20 年的大好时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冲击,发展迟缓。按邓小平的话讲,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实际上,在 1955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就产生了“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当时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所谓“小脚女人”进行了批判,主观地认为全面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不适当地批评“左倾”,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提出了过急的设想。这种急于过渡的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为后来出现的“左”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1957 年 6 月 19 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由于当时对所谓“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入了一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同时,讲话也删去了对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们的批评以及对王蒙小说的肯定等。由于讲话夸大了阶级斗争,因此,给人们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蒙上了一层迷雾。

随着对阶级斗争现状的夸大,党内“左”的错误逐步升级。不少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热情,搞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而毛泽东对干部和群众的这种盲目热情又给予了肯定和赞许,因此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的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距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南宁会议精神传达后,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很快发展起来,一些部门和地区开

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同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反冒进,并提出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从而助长了片面追求多与快的“左”倾冒进情绪,造成了只反右、不反“左”的局面。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的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报告采用了国内有两个剥削阶级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论点,这就为反右斗争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由酝酿发动阶段进入了全面开展阶段。北戴河会议以后,“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具体表现为:

第一,经济建设不量力而行,指标越抬越高,浮夸风严重发展。

北戴河会议在制定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时认为,“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期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在最短期间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为了实现这个超高指标,会议认为,1958年的农业生产“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因此我国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工业上来。会议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努力。”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在《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主要的政治任务,1070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一吨也不能少。从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当时片面强调炼钢的重要性,以为钢解决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并提出了为“钢铁元帅升帐”而让路的口号,强调算政治帐,忽略了算经济帐。全民炼钢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工农业比例失调,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由于在农业上指标越抬越高,使得浮夸风也严重发展起来。1958年夏季以后,一些地区和部门竞放“卫星”,虚报产量,大搞浮夸竞争,小麦亩产出现了7320斤,早稻亩产13万余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更加渲染了浮夸的气氛。

第二,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急于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过早地提出过渡问题,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业上严重的浮夸风,使许多人在考虑问题时,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生产关系上出现了急于过渡的思想。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之后,一些地区就